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Jiegou de Wenhua Zhengzhi Shijian

# 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

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

■ 李应志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Jiegou de Wenhua Zhengzhi Shijian

# 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

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

■ 李应志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  
李应志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0

ISBN 978-7-5426-2928-9

I. 解... II. 李... III. ①斯皮瓦克,G. C. — 思想评论  
②斯皮瓦克,G. C. — 生平事迹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001 号

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

---

---

著 者 / 李应志

责任编辑 / 陈宁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徐曙蕾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450 千字

印 张 / 17.25

---

---

ISBN 978-7-5426-2928-9

I · 408 定价:35.00 元

## 导 论

短暂的遗忘将会导致长时间的手忙脚乱,西方理论持续的变化和引进似乎已经让人有些疲惫,其中出现的问题更是此起彼伏。在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追随并不是我们必然的命运,但因为疲惫而忽视学习也决不可能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后殖民理论随着赛义德《东方主义》走进中国时,也曾使人们陷入一段时间的持续兴奋之中,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痛苦反思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法宝,一种思考的新维度。但很快,人们又因为后殖民主义理论背景与中国具体情况的差异而绷紧了神经,<sup>①</sup>难道它真是现代文化市场上昙花一现的时髦的理论消费品?的确,令人有些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让一些人又爱又恨,取之不及,而舍之,又对复杂的当今世界手足无措,陷入失语之中。尽管我们今天对西方时内心充满复杂的情感,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提出的问题始终包含了我们真实生活的某些部分。后殖民理论涉及的问题就是如此,正如其他西方理论进入中国时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当初人们的兴奋并非毫无理由。问题不在于情景差异使得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丧失了延续其生命的根基,而在于我们是否在其中学到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延续其生命的方法。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中,我们的职责不仅仅是从西方理论中获得对世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得如何面对世界的方法。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状况一样,令人鼓舞的时刻总是那些把方法的精髓运用于具体情景的时刻。

---

<sup>①</sup> 许多学者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可能导致的民族主义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赵毅衡《后学与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等著作和文章中的观点。

如果说赛义德的重要的贡献在于理论、在于开辟了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域的话,那么斯皮瓦克作为继赛义德之后的当代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和理论家,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对解构主义的精到理解和解构方法的成功运用。因此与赛义德相比较而言,斯皮瓦克的工作中心在于批评,后殖民文化领域则是她批评实践的一个场所,而支撑这一批评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则来源于解构主义,无论人们——包括德里达在内,对解构的理解和谈论多么深入,但在文化批评实践上,斯皮瓦克取得的是最令人信服的成果。她没有试图在西方哲学的理论链条上延续解构主义,而是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交叉地带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但她主要的工作不是扩展后殖民批评领地的范围,而是在这块园地里拿起解构主义的尖锐锄头开始耕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是解构主义的文化政治实践。本文认为,即使斯皮瓦克涉及的论题就像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样不能在中国目前的具体语境中进行横向移植,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并且在方法论上、在我们如何处理理论的问题上,她的批评对我们仍然富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斯皮瓦克生平

盖娅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194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及比较文学系教授,是继赛义德之后的当代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和理论家。因其涉猎广泛的论题,对多种学科知识的融合运用以及她极富争议和冲击力的批评实践,被称为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sup>①</sup>也和齐泽克一起被认为是当代最具有冲击力的后马克思主义作家。<sup>②</sup>

关于斯皮瓦克的出身,我们可以用双重性来进行大致的描述。1942年她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是印度教徒,但都受到过高级的教育。斯皮瓦克说,她的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低层,同时又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上层。她儿时记忆中最重要无疑

<sup>①</sup> Spivak, *In Other Worlds*, Methuen, 1987, ix.

<sup>②</sup> Rey C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 *Diacritics*, Spring, 1993, P3.

是印度的独立,它既不同于独立前的那一代、也不同于独立后的那一代的记忆。斯皮瓦克的中学时代是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度过的,关于这一点,她对自己的父母充满极大的感激之情,她感谢父母没有把她送进当时更加高级时髦的、西式的女子修道学校或者更加不时髦的本土学校,<sup>①</sup>在这个学校里,老师是来自最底层的土著民,但他们又是有一定西方学养的基督徒;学校等级较低,但教学质量好。用的是斯皮瓦克的母语——孟加拉语教学,但又十分注重英语的学习,因为英语仍旧是走向上流社会的有力工具。

中学毕业以后,斯皮瓦克进入加尔各答大学英语系。加尔各答大学是一个高质量但没有等级界限的学校,在那里她得以接触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同时她认为对她影响最大的是那里的左派知识分子所营造的活跃的政治气氛。她后来在巴黎的感受常常让她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1959年,斯皮瓦克“成为英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并获文学学士学位,且同时获得英国文学及孟加拉文学金质奖章。”

1961年斯皮瓦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在英语系,后转入比较文学系。1967年在导师保罗·德·曼的指导下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先后在爱荷华大学、奥斯丁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地任教,在美国十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除此之外,几乎全世界都留下了她讲学的足迹。<sup>②</sup>

在这些经历中,有两个大的方面奠定了她批评的最初的基础,一个是印度本身遭受压迫的情况,一个是二战时期印度“人民剧协”的斗争形式。

尽管她出生时,印度殖民历史中最艰苦的岁月已经过去,但她在英国为应付二战而造成的印度大饥荒中出生;虽然自己的家庭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仍然进入了她幼小的心灵。他们的痛苦和反抗成为了印度整个苦难岁月的缩影,加上后来她在大学所接触的各种人群,所接受的左翼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潜在影响,使得她能够比较自觉的关注各种压迫和不平等,这种关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例如在谈及西方女性主义的“身体书写”时,她联想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和人

①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Routledge, 1993, P10 - 11.

② 曹莉《史碧娃克》,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5 页。

民的情况,认为那是一种“政治的身体书写”。她说:“在我的家乡有30万人都无家可归,住在大街上。小孩子在下水道大便,因为没有厕所。要是你看到那些大便的颜色,你就会知道他们根本活不长。”<sup>①</sup>发达国家的工人可以失业,但他们有事干,在第三世界国家就并非如此。

1943年,英国为了应付二战的军费和贷款,把大量的负担转嫁到印度头上,工人和农民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1943—1944年最严重的饥荒和瘟疫中,仅孟加拉地区就死了340万人。<sup>②</sup>“人民剧协”(the Indian People's Theatre Association, IPTA)的演出就是针对这一人为的大饥荒和英国殖民剥削而进行的一种反抗斗争。英国殖民当局把直接的反抗作为非法行为,但承认文艺规律特殊的自治性。“人民剧协”正是利用这一点,使得文艺以其合法的地位达到了政治反抗的目的,那些优秀的剧目和歌曲在今天依旧延续着它的生命力。虽然文化批评也是今天学术氛围的一个部分,但文艺与政治的有效连接无疑在斯皮瓦克后来的学术批评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强化作用,她的文化政治实践正是沿用的这种斗争形式。

斯皮瓦克身处的特定现实环境也是激发其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重要因素。斯皮瓦克特殊的身份背景使她成为美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但同时作为二战后的一代知识分子移民,尤其是像斯皮瓦克这样在高校中从事教学的移民,与其他少数民族中的成员相比,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这种地位使得她在学术生活中被别人看成某种象征和“滑稽的‘领导’角色。”尽管她在实践上并不刻意拒绝这种角色可能带来的学术活力,但是她对“象征”这种“同质化”方式有着相当的警觉,因为实际上,她“在西孟加拉不扮演任何角色”。<sup>③</sup>在美国,那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面临的正是这种“同质化”问题。在斯皮瓦克看来,“同质化”带来的是双重危险。一方面可能为特权群体利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众多的主体角色说话,但听众如果来自特权群体,他们则可

①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②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页。

③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以挑选他们感兴趣和想听到的部分,把不想听的部分“忘掉”,以其貌似客观的听者角色来掩盖其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来自第三世界内部的投机者则利用这一点把自己提升到代表全部移民,或者代表第三世界人民的高度,达到个人暗藏的商业或者政治目的。<sup>①</sup>

总之,斯皮瓦克的经历与其后殖民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来进行总结,她曾对别人说:

我有一个母亲,那就是加尔各答,我也有一个富于营养的继母,那就是美国。两个都很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获得了批评这两个地方的权利。<sup>②</sup>

“在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家的感觉”。斯皮瓦克的双重文化特征与她的归依感的缺失是紧紧相联的。当然,斯皮瓦克走向后殖民文化批评、直面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及其后果的过程,不能说仅仅是为了追问这种失根的感觉,但对这种感觉的思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它使斯皮瓦克得以从头反思后殖民主义涉及到的各种问题。

“批评的权利”是一种简略的、象征性的表达,但正是这一点包含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不仅可以切入后殖民主义本身,并且还可以从中领会到斯皮瓦克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简单说来,“批评”不是简单的指向“两个母亲”,而是涉及两个“母亲”在整个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进而涉及到我们对今天的后殖民主义景况的理解。从关系的角度看,两个“母亲”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前殖民地和宗主国、今天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原型。而“权利”问题则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批评作为二十世纪末期的一种特定思潮的具体情景相关:它既包括了后殖民批评主体在总体上的身份杂糅状况,同时也在更具体的意义上包含了斯皮瓦克那建立在解构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对自身身份的特殊理解、自我解构和利用。下面,我们将围绕斯皮瓦克所说的“批评”和“权利”两个词语所关

---

① Sarah Harasym, ed., *The Post - Colonial Critic*, Routledge, 1990, P 60 - 61.

② *ibid* P 82 - 83.



联的意义领域来考察后殖民文化批评以及斯皮瓦克在其中的位置。

## 二、斯皮瓦克与后殖民主义

### 1. 作为批判理论的后殖民主义

“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在逻辑上，我们首先要面对这个问题。尽管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不可能存在一个自足而纯粹的、叫做“后殖民主义”的东西等着我们观赏，但从与此相关的讨论中去把握、领会“什么是后殖民主义”这个问题还是可能。德里克说：“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发展迅猛，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立场，结果这一术语的理解和使用混乱甚多”。<sup>①</sup> 不过，总的说来，这种“混乱”主要是“后”这个修饰语搅出来的，即究竟“后”在何处的问题。由此生发出的大量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时间，究竟是殖民主义结束之后，还是与殖民主义相伴而生，甚至一直延伸到现代性之初；其次是含盖的地理范围，究竟是前殖民地国家还是与殖民历史相关的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存在内部殖民的西方世界在内的全球；第三是主体，究竟是第三世界人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第一世界中的移民，还是包括第一世界中的西方文化反思者在内，或者仅仅是几个“抵达第一世界学术园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等等。就本文的重心来看，我们要辨析这些复杂多向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先用德里克的看法作为一个临时的起点。尽管德里克本人对后殖民有极为鲜明的批判立场，并力图用“后革命”取代“后殖民”，但他对后殖民主义进行的描述依然是较为客观的。他认为，“后殖民”一词大致有三种“格外显眼”的用法：

(a) 从字面意义上描述曾是殖民地的社会的状况，……这里所说的殖民地既包括以前归属于第三世界的那些地方，也包括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个通常与第一世界联系在一起 的移民者的殖民地。(b) 描述殖民主义时期之后的全球状况，这种用法中它的所指多少有些抽象而不那么具体，就其模

<sup>①</sup>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糊性而言也与早期的一个术语,第三世界,不相上下,实际上它本来就是想要替代那个术语的。(c)描述论及上述状况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是通过由这些状况产生的认识论和精神方向来传达的。<sup>①</sup>

徐贲根据利奥塔对“后现代”所进行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审美领域的后现代,哲学、思想领域的后现代和现实的文化政治批判领域的后现代——对“后殖民”进行了类似的层次划分:

第一个层次是指那些与殖民地经验有关的写作和阅读。……第二层次是指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殖民化主体”的构成,对第三世界本土历史的消声……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结构范畴。第三个层次是指第三世界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批判,以及其对抗形态和策略。后殖民批判的抗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相同。<sup>②</sup>

这两种总结方式中,德里克的“三种用法”主要集中在后殖民话语力量所覆盖的范围上,而且就他本人的看法,以海伦·蒂芬、阿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斯以及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前两种用法,都因为含盖广泛而失去了时间和地域的明确性,同时也不可避免的牵涉到具体时间和地域中的主体等方面的模糊性问题,不仅包括了殖民之外的许多内容,同时又排除了许多殖民之内的内容。因此他认为:

后殖民,与其说是一种对事物的描述,倒不如说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试图用那些将自己看成是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建构世界;重申我最初的说法,他们是走入第一世界学术圈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后殖民性的关注看上

①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②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7页。

去好似是表达了对自己身份感到的痛苦,实际上更多的表达了一种新找到的力量。<sup>①</sup>

提出德里克的这种看法是因为在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众多观点中,它具有一定代表性。这些批评几乎都从后殖民话语的具体起源和代表人物身上看到了后殖民话语背后的主体身份、动机和语言等方面的矛盾。这些批评体现出一种对于思潮精确性和广泛性的综合追求,而实际上广泛性和精确性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对后殖民的批评一方面提出了许多后殖民理论可能存在的危险,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出话语争夺与反争夺的痕迹。

徐贲的总结避开对后殖民话语的外围描述,直接指出后殖民理论的表现形态、内容实质和思想立场。从表现形态来看,尽管后殖民理论具有较强的政治的和实践的色彩,但它都没有越出文化和学术的园地,在对抗性问题上与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截然不同,这大概也是后殖民理论“后”学色彩的一种表现。从这些阅读和写作的内容实质来看,后殖民围绕的中心显然不是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占领,而是以政治经济为目的的更为彻底有效的文化占领或文化殖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独立之后”除了界定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话语的起源时间外,在界定后殖民理论本身所包含的有效范围方面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以政治经济为目的的文化殖民并没有经历任何形式的“失败”和“撤退”,相反,苏联的解体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步步进逼标志的恰恰是它可能出现的全面胜利。而在思想上的对抗立场表明:后殖民理论排除了帝国主义的这种“和平演变”式的策略对第三世界的“拯救”动机。因为不管是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发展还是从“野蛮”到“文明”,第三世界得到的“恩惠”都是以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胜利为前提。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世界中的“少数后殖民知识分子”关于自身存在的身份和历史的表述困难,就只是后殖民理论诞生的一个起点或契机。德里克的批评实际上表示了他对后殖民话语的理论能量的更为急迫的期待心情,在立场上并无冲突。

以上两个版本的总结,一个立足于问题意识,一个立足于精神内

<sup>①</sup>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涵。在问题意识中出现的各种分歧和批评,上文已经说到,可能出现话语权利的争夺,<sup>①</sup>但总体来看,如阿赫默德·凯图·卡特拉克、德里克等的批评,都更着力于使后殖民理论“根基牢靠”。在其作为一种对抗性批评的精神内涵上并无太大差异。因此本文并不试图为后殖民主义权衡出一个稳妥的概念,而是立足于这种一致性来大致描述后殖民主义逻辑上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它作为对抗性批判的核心所在。但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及西方文化的批评并非开始于后殖民主义,因此,要理清这种批评的精神内涵及其独特性,简要的展开他们之间的关系场是必要的。

简单说来,后殖民主义在20世纪末期走出前台,基于两条线索即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和对这两种历史进程的批判反思的合流。一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现代发展历史及其反思,一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外(或大写的“东方”)的殖民历史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抵抗。后殖民主义在今天所遭遇一系列困难表明,单纯从西方的逻辑线索来看待后殖民主义,就会把它当成西方“高深理论”的话语延伸;而相反,如果仅仅从民族国家的反殖逻辑来看待后殖民主义,那么我们就可能无法正确的看待后殖民主义的身份困境,以及它与今天的第一世界学术圈之间的关联。

首先,我们大致看看第一个方面。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sup>②</sup>实际上,在文学领域中,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可以说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最为有力的批判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生发出来的社会革命,在它看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

---

① 如牛津大学的彼得·康拉德1993年在《观察家报》上发表的对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书评;一些学术史著作的“制裁性藐视”,历史学家罗素·雅可比对后殖民批评家的跨学科能力的置疑;约翰·麦肯齐《东方主义:历史、理论与艺术》认为这些“左派文学批评家”“幼稚”且“考虑不周”等——参见 Bart Moore - Gilbert, *Postcolonial Theory*, Verso, 1997, P 11 - 14.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8页。

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规律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私有制社会中并没有失去它的有效性。但是资本主义历史在不断推进,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却一波三折,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这种状况,促使他们思考新的可能性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对社会危机的调节和干预,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分化和收编,重举经典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这种方式已经不太可行。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批判中,对抗性逐渐转入文化领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最终目的上并没有太大改变,但在具体的批判手段上却有所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理解,仍然具有较强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如卢卡奇就认为历史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是由我们的行动构成。不过,因为经济地位的分化,工人阶级要促成行动,就必须首先跳出经济决定论的狭隘视野,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的状况,造就整体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9页)。这实际上已经设定了文化行动之于政治革命的优先性。葛兰西也认为,既然每个人都必然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那么,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目标上,一种具有统一世界观和坚定意志的集团就十分重要了。在这个方面,政党作为一个特定的掌握领导权的力量,不仅具有集中阶级力量的作用,同时也是人们形成自觉的自我(政治)意识的基础。<sup>①</sup> 不过,这里的“领导权”就其首要的任务来说,是“文化的领导权”：“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们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制定出与之相符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sup>②</sup> 不管是卢卡奇、柯尔施还是葛兰西,尽管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批判,但文化和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和阶级斗争来说,却占据着首要的位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转化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凸现。基于对包括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在内的“独裁国家”的考察,法兰克福学派放弃了阶级

<sup>①</sup>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54页。

<sup>②</sup> 同上,第246页。

革命的想法,从文化到阶级斗争的两步走模式现在被集中在文化方面。革命应该是“自发的”和“渐进的”,与任何体系、制度毫不相干,而且,“除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之外,任何经济的或法律的措施都不可能导致制度的民主化。”<sup>①</sup>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拒绝是以批判理论来实现的,因为,立足于现实危机的批判的理论就是实践本身。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绝对的批判立场已经变成了革命本身,以至于“进步”也是需要彻底进行批判的——“进步就发生在它结束的地方”。<sup>②</sup>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判,但也悲哀的看到,马克思认为蕴涵了自己毁灭的种子的资本主义却成功的阻止了革命的途径,革命力量被分散,意识被同化,意志被消磨。资本主义利用了人类追求快乐这一“爱欲”本能,其秘密在于用“物质消费”这一“虚假的需求”压抑和掩盖“爱欲”的其它需求。因此,文化上的革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心理层次,首先把被消磨的意志重新调动出来。<sup>③</sup>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幅不断遭到批判的“讽刺画”,即使人们都认识到它出现的各种问题,但它却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前进而有所涂改。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被迫适应并习惯去欣赏这幅画面。不管怎样,在表现形式上看来,它更像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胜利并不意味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启蒙学者设定的价值目标很难说取得了进展。阶级压制也好,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和物欲刺激也好,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调整和文化控制也好,单纯从对抗性的“压制”着眼,都不能更根本的揭示资本主义既带着残缺又一路凯歌的秘密。因此把反思源头伸向启蒙设定的整个现代性方案,并在深度上检查这套方案的基础观念,从而在整体上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和今天出现的新状况,从事后分析的角度看,也是合乎逻辑的。后现代主义复

① 霍克海默《独裁国家》,《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纽约1978年版,第102页,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② 《否定的辩证法》,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③ 马尔库塞《单面人》,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276页。

杂的批判事业不仅围绕“人”这个“发明”，并且进一步延伸到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这应该是对西方最为彻底的一次体检了。简要说来，二元对立这一植根久远的思维不仅塑造了西方人战胜自然的信心，同时也助长了人与人之间压制与反压制的好斗天性。独立的“人”的发明——笛卡尔以最无可置疑的公式建立起作为主体的、独立的个人相对于其余一切存在对象的优先性——取得的不过是这场斗争的合法性而已。问题就在于，这种合法性是以知识的伪装出现的，这大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它以看似客观的、抹平差异的方式使压制合法并且难以觉察。对二元对立这种斗争思维方式的检查，最终落实到德里达无中心的、结构性的差异关系的恢复。而对“人”这个晚近发明的检查结果，落实到福科的说法：“人”死了。既已死去，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知识客观性伪装也就露出它与权利压制结盟的本来面目。这正是西方的所谓“高深理论”得以出场的一个重要背景。

需要说明的是自然科学。韦伯曾经指出：

“通过精密自然科学，人既然可以有形地把握他的作品，人就希望找出他对世界的旨意的蛛丝马迹。然而今天情形又如何？除了几个老儿童——在自然科学界，还真有这种人——谁还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上的知识，能够在世界的意义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有所启发？谁还相信自然科学能够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要循哪一条路才能找到它的踪迹？其实，照这些自然科学的倾向，一旦它们真要涉及这些问题，那么有所谓世界的“意义”存在这个信念，将会被它们从根铲除。<sup>①</sup>

这一指责可能稍微有些苛刻：尽管科学的进步也给我们留下屠杀、战争、和尖端武器的无休止的比赛这样的伤心事情，但它也可用于改善我们的生活。事实上，自然科学带来的生活享受始终是现代知识、乃至“文明进步”最为雄辩的辩护辞。因为，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面对沉

<sup>①</sup> 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学术与政治·韦伯作品集 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2 - 173 页。

默而无力为自己声言的大自然,似乎所有的人都站在了一起。这种科学带来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压制者被收编吸纳,另一方面,也成为帝国主义向外殖民的有力武器,只不过对那些异文化者而言,带给他们“利益”的同时,也不排除科学附带的破坏性试验。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下,我们是否可以从生态政治中听见大自然在夹缝中发出的呻吟?

殖民主义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有着同样悠长的历史。当然也是后殖民主义出台的一个最重要的线索。简要说来,欧洲冒险家、投机商和异国情调追求者等逐渐搬进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是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机制,赤裸裸的资源劫夺总是伴随着商业贸易、资源开发、以保护欧洲人利益为名的政治上的进一步控制和以慈善、拯救、开化等为名的文化上的渗透。不管怎样,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唯一目的是利润,它与其他遭到抵抗的和某种程度上被“认可”的方式一起相互配合、至少是相互兼容而不是相互抵触。但是,尽管如此,那些“愚蠢的野蛮人”并非一点不能识别。因此也可以说同样历史悠久的,还有欧洲殖民者所遭遇的抵抗。尽管政治与文化占领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利益,但在整个反抗的历史过程中,处于前台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因为权力控制跟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相对而言,文化上的反抗则处于后台运行。殖民反抗的结果,以英帝国为例,有大致三个阶段,也预示了三种情况:一是18世纪末美国的独立;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以欧洲移民为主的“自治领”(Dominions);三是二战后的民族国家的独立。<sup>①</sup>就前两个阶段的情况来说,本土居民,如加拿大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土著部落、南非的黑人等,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抵抗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本土文化处于沉默的边缘,比如美国,在文化上几乎就是第二个欧洲。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但这不是恢复土著民族的自主权,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英帝国的关系是母子关系。通过艰苦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民族独立的是第三阶段的亚非拉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经过了战争、民族起义以及印度的“不合作运动”、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最终在二

---

<sup>①</sup> John McLeod,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8-9.



战这种特殊机遇下取得了民族独立。

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政治的独立并非意味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殖民主义像一架发动机把民族国家拉入了某种其自身很难偏移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价值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于已经“脱离”了关系的前宗主国,在方向上离他们的家乡越来越远。例如印度,不列颠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sup>①</sup>在全球化形式下,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在政治斗争之后,民族国家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无物之阵”。显然,这个“无物之阵”虽说是独立后才凸现出来,但其形成却贯穿了整个殖民历史。因此,如何理解、分析和清理这个新的对象,就成了一种新的历史任务。“一旦政治解殖民化的过程已经发生,文化上的解殖民化就一定会紧跟其后……正如伟大的肯尼亚小说家 Ngugi wa Tiong 所说,现在的问题是对头脑进行解殖民,取消其中心”。<sup>②</sup>

文化上的反抗并非开始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批评。在民族独立之前,文化斗争一般依附于处在前台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如印度提拉克提出的“斯瓦拉吉”政治纲领,“斯瓦拉吉”在吠陀经典中意思即“自主”,作为政治纲领,意味着争取印度的独立。<sup>③</sup>提拉克在这里利用了印度教来发动群众投入民族斗争。由于印度教在殖民统治中同样受到基督教的冲击,所以,提拉克把拯救民族和维护印度的宗教联系在一起。他说:“一个共同信仰的宗教是使人民互相接近和同情的重要手段。”<sup>④</sup>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同样的思路。另外,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也存在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的文化反抗。例如在北美的“黑人奴隶叙事”,印度的“人民剧协”等。他们不仅遭受压迫,并且还经受真正意义上的背井离乡的痛苦,因此他们的文化“失根”既是隐喻

①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② Robert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65.

③ 林承节《印度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④ S·巴帕特编《提拉克著作言论选集》,转出处同上,第273页。